



□代生

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它的研究目的、对象、过程、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简要谈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独立起源并延绵发展至今的原生生态文明，但文献有关古代中国的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再往前计就有较大的分歧，尤其是一些国外学者据此否认夏代的存在，从而否定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为了科学编排夏商西周的相关年表，从1996年5月开始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此项工程由李学勤、李伯谦、仇士华、席泽宗四位学者担任首席科学家，200多位学者共同参与，通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交叉的方式联合攻关，于2000年9月通过项目验收，形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基本建立了西周的年代序列，并确立了商代盘庚迁殷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代始年约为公元前1600年、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的大致年代框架。在断代工程结项前，学者们深感在政府的支持下，以集体项目、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因此李伯谦、赵辉、王巍等先生建议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全面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以及早期发展的特点、路径等重大问题。该工程于2001年11月获得国家立项，从2002年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多学科交叉的手段，联合国内外近400位专家学者进行攻关，先后被列为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五”期间的重大项目。

（上接1版）

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政治上建党的思想精髓、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重要原则、基本路径和着力点，并在实践中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聚焦和解决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明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管党治党理论。“根本目的”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动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新的历史条件，立足两个大局，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要求，抓准了这把从严管党治党的金钥匙。

阐述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权威理论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历程

从2002年至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总体可以分为预研究、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等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重心各有差别。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阶段（2001—2003年）。这一阶段由李伯谦、赵辉和王巍总体负责，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九大课题，共有90多位学者参加，主要以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为探源工程的正式施行提供合理方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一阶段（2004—2005年）。该阶段以“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为题展开研究，设置了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文明形态研究等五个重大课题，并围绕晋南豫西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文化分布范围和华夏文明起源问题开展工作。考古学者通过对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大致建立了夏代的考古学谱系，为确定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与此同时，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进展，观象台遗址的发掘可以和《尚书·尧典》记载密切相关，为论证陶寺文化为尧舜都址提供重要线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二阶段（2006—2008年）。这一阶段，研究时空均有较大扩展，首先是时间延伸至公元前3500年，研究的空间也扩大到了整个长江、黄河和西江河流域。设置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的变化、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等四个重大课题，其中年代学研究成果突出，依据新的资料和技术，对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年代框架进行了更新，龙山文化的整体年代下限下移了200年。学者们提出，黄河下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文明形态，中原地区则是多种文化汇聚而进入早期国家；中国文明形成是周边文化融入中原的文化多元一体化过程。这一阶段的相关成果主要汇聚于多卷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键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强调要加強党的集中统一。在总结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更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条根本性的组织原则，写进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章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维护权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提出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两个维护”更加明确了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指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宗旨原则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把群众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三阶段（2009—2012年）。这一阶段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从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研究，扩展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技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四阶段（2013—2018年）。这一阶段项目设置延续了第三阶段的方案，将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至整个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和边疆地区。

根据首席专家王巍介绍，第三、四阶段主要关注各自领域的研究与文明演进关系的研究，重在分析解答环境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为研究和解释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背景、原因和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提供条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五阶段（2020—2024年）。该阶段由陈星灿、张弛担任负责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重点转到区域文明化进程方面，设置了北方长城地带、中原和海岱地区、长江流域等三个课题，并对中华文明起源进程进行整体性研究。

几个阶段的研究，由公元前2500年逐渐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研究区域范围由中原地区逐步扩展到黄河下游，长江中游、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等，研究的内容也由考古分期、聚落形态逐步拓展到自然环境、生业、资源与精神领域，对文明的起源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未来的探源工作任重道远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举行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会上公布了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介绍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形成历程：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总的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年间取得的成果极为丰硕。一是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

程”，从时间深度确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性；二是通过分区研究和综合研究，对中国各区域的文明进程进行了立体式研究，如对良渚文化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等长时段 的发掘和考古分析，确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空间广度和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模式、道路与特点有了整体性、深层次的 理解；三是破除了西方学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束缚，依据中国考古资料，兼顾其他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这不仅适用于中国文明研究，也适用于如玛雅、埃及等文明的研究，“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后，国家文物局从2017年开始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点关注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其中已经启动的“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等项目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密切相关，通过系统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将极大推进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学术价值重大，需要有组织有计划推进，长期开展的系统工程。20年的探源工程取得的只是一个初步的、阶段性成果，接下来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下一步，探源工程将综合各地中心遗址发现和研究的平衡性，关注更多区域的文明的形态；深入研究更早的年代（距今8000年乃至10000年）文明起源的早期情况，展开整体性综合研究并在理论上不断总结、深化，与此同时还要做好普及工作，以史育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殷切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 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问题、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 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建设的群众基础。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政治建设喻为“政治指南针”，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在谈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时，指出：“不能指望泛泛抓一抓或者集中火力打几个战役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他还通过引用“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等古语和警句，重点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人民立场、系统理念和底线思维。又如，在谈及政治方向的重要性时，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的故事。以此来勉励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认识，不能在方向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在讲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问题时，他又引用“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军”的故事，为广大党员干部阐明了服从指挥、令行禁止的道理。再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许多场合中大量使用“绅士”“明白人”“老实人”“围猎”“靶向治疗”“天网”“堡垒”“俱乐部”“高压线”等生活用语，以此来说明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这些丰富话语形式独具匠心的运用，创新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伟大实践中的一个典范。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宋代兴化仙游人（今属福建省），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宋仁宗庆历年间，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贡茶。蔡襄在前人所制“大龙团”茶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制出“小龙团”茶，由于制作工艺复杂、严谨，对原材料的选用又极为严苛，所以制出的“小龙团”茶品质上乘，数量稀少，成为当时皇室御用的顶级茶饮，声名远播。宋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

后来，蔡襄把制作“小龙团”茶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叫《茶录》，此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盏、点茶十目；下卷《论茶器》，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目。详细论述了如何分辨茶叶、保存茶叶以及品茶 的流程和所需器具等。

如何分辨茶叶品质的优劣呢？首先从色泽上，“茶色贵白”。由于宋代的茶是制成饼状的，所以鉴别好茶分为三步，第一步，从茶饼颜色上鉴别，茶饼应洁白如玉；第二步，把茶饼碾成粉末后，粉末应呈白色；第三步，粉末冲水调匀后，茶汤颜色鲜亮且呈青白色的，就是上 等好茶。

接着，从味道上，“茶味主于甘滑”。茶汤的味道以甘甜爽口为最好，蔡襄还进一步指出，“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只有福建的凤凰山生产焙制出的茶，味道最好。“隔溪诸山，虽及时加意制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由建溪隔开的其他山岭，虽然及时采摘、精细制作，但茶色、茶味都比较浓，比不上凤凰山的茶品。同时，蔡襄还认为，“茶有真香”。纯天然的茶是最好喝的，“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奇益甚”。沏茶时，不要添加任何香料，否则就品尝不出茶叶本身的纯正味道了。这和我们今天的饮茶观点是一致的，茶叶还是不添加其他任何香料，纯天然 的为最好。

那么，如何保存茶叶呢？蔡襄在书中描述：“以箭叶封裹入焙中”，茶饼应该用嫩香蒲叶包裹密封 后，放到茶焙里保存。这和现在用真空包装的方式保存茶叶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把茶焙放置在温暖干燥的地方保存，而不能放到潮湿阴冷的地方，“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温以御湿润”。而且，每隔两三天，就用小火慢慢烘烤一遍，以防止被潮气浸湿。“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但火也不能太大，否则就会把茶烤焦而不能喝了。可见，在宋代，由于保存茶叶的条件有限，所以，要想保持茶叶 的上好品质，还需要颇费一番功夫的。

接着，蔡襄谈到了一道关键的工序，就是“候汤”（即烧水），他说“候汤最难”，难在哪儿呢？“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如果水没有烧到一定温度，沏茶时茶沫会漂浮在水面；如果水温烧得过高，沏茶时茶叶就会沉入水底，都不能沏出完美的茶汤来，因此，水温要烧得不高不低，恰到好处为宜。这种控制水温沏茶的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比如绿茶、白茶，水温要控制在85度左右；红茶，水温要控制在95度左右；黑茶、乌龙茶，水温则需要100度。如果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的营养成分，茶汤也会发苦发涩，影响口感；如果水温过低，茶叶中的营养成分不能完全析出，同时也泡不出茶叶本 身的味道，饮用起来口感不佳。

接着，要选择茶杯、茶匙。茶杯的选择，“宜黑盏”，因为宋代人喜欢用冲泡后呈白色的茶水，所以选用黑色的茶杯，能最大限度地映衬出茶水的纯白颜色来，观感甚好。在书中，蔡襄为福建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生产的茶杯作了推介，“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焙之久难冷，最为要用”。他认为，福建建安生产的茶杯工艺考究，黑中带红，釉表面上的白色细纹如兔毫，纤毫毕现，非常美观，它的坯胎略微有点厚，因此，加热后，茶汤在较长时间 内，都不会冷却，是茶杯中的上品。“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他地方生产的茶杯，有的坯胎薄，有的颜色紫红，都比不上福建建安制造的黑釉兔毫杯。在茶匙的选择上，蔡襄认为，“茶匙要重，

宋代蔡襄和他的《茶录》

□李宁

击拂有力。黄金为上”。茶匙的质量要重，这样在搅动茶汤时才好用，所以，黄金制造的茶匙是最好的。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预热茶杯，“先须盏令热，冷则茶不浮”。先用热水或炭火把茶杯烫热，如果茶杯不烫热的话，茶水煮沸时产生的浮沫就漂不起来，而宋代人认为，这种漂浮起来的浮沫是茶叶中的精华，营养甚佳，最该饮用，所以，漂浮上来的浮沫越多越好。

接着就是点茶（即沏茶）。这道工序中的茶和水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谓面聚”。茶少水多时，茶汤表面形状散乱；水少茶多时，茶汤就像熬的粥面一样混沌。因此，茶和水一定要恰到好处，正确的方法是，“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用茶匙取出一钱七分的茶叶放在预热后的茶杯里，并往茶杯里面加水，把茶叶调匀均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再不断地围着茶杯内壁的四周旋转注水，并用茶筴（一种沏茶的器具）拍击拂动，其动作一定要有飘逸感和节奏感，既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又容易产生更多的浮沫，浮沫越细腻、越纯白越好，这种浮沫还可以做成多种图案，类似于现代的咖啡拉花，极具观赏性。“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当水注入到茶杯的十分之四处时，就停止注水，这时候茶汤看上去鲜亮度、纯白度最佳，在靠近茶杯边缘的地方，没有留下茶汤痕迹的，就是上等茶汤。比赛茶的优劣时，“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如果谁的茶杯边缘先出现了水痕，就失败了，后出现水痕的，就胜出。这种沏茶的方式流传到日本后，逐渐发展为日本茶道，沿用至今。

茶，始于神农，兴于唐，盛于宋，宋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茶录》是一部反映宋代茶文化的经典之作，向世人展现了宋代茶饮的美学意境，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后被译为英文、法文，流传海外，对世界的茶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